



陈建功

陈建功（1949年—），1949年11月出生于合浦县南康镇。中共党员。

1968年参加工作，历任北京市作家协会驻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一级作家职称。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委会委员，第七、第八、第九届副主席。全国政协第十、十一届委员。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

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北京市作家协会，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皇城根》（合作）、作品集《建功小说精选》《建功散文精选》、短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中短篇小说集《陈建功小说选》、中篇小说集《前科》、随笔集《从实招来》《北京滋味》等。

小说《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分别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北京文学》杂志奖，《鬃毛》获《十月》杂志文学奖，《太阳石》获《东方少年》杂志中篇小说奖。根据中篇小说《找乐》改编的同名电影获1993年柏林电影节青年影评大奖、东京电影节金奖、西班牙圣塞巴蒂安电影节奖、法国南特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放生》获庆祝新中国成立45周年征文优秀奖，《皇城根》获庆祝新中国成立45周年长篇小说佳作奖，特写《探访：大饭店WC》获庆祝新中国成立45周年报告文学佳作奖等。

部分作品被译为捷克、韩、日、法、英等国文字在海外出版。

北京滋味的写作生涯

北京滋味

陈建功在 1977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前，就已经开始搞文学创作了。只是，那时陈建功创作的诗歌是以别人的名字发表在《北京日报》。他曾介入文革结束后第一本大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的创办，也曾创作了一系列在 80 年代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90 年代中期，他参与并见证了中国作协的发展。他至今也未放下手中的笔。可以说，陈建功的创作，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陈建功自 1999 年进入中国作协起，此后十几年，经常参与中国作协的活动，可谓劳苦功高。一般从事作协工作，一边写作，还一边修炼自己。长期的写作生涯让他养成了亲切随和、直率豪爽的性格，以及阅世弥深的犀利和不逢迎、不阿世的风骨。他的睿智和通达、敏锐和见识，来自于早年命运多舛的磨炼，来自时代变革大潮中北大精神的熏陶，也来自“平民北京”文化的启迪。

“乐天知命，宽厚处世，转着圈儿理解别人，理解人生，理解时代，这就是北京滋味……”陈建功说的是北京人，也是他自己。

从京西煤矿的采掘工人，到北大中文系的才子，再到中国作协第七到第九届副主席，陈建功的写作，甚至在作协担任领导的处事风格，似乎都浸润在他的北京滋味里。

出手不凡

陈建功考上北大文学专业以后，有位老师的话让他铭记在心。老师说，判断一部作品，不能只看一时是否走红，五年以后还能不能看，十年八年以后呢？经过历史的淘选，过几十年你的作品还能看，就已经不错。这说的就是文学的生命力。而这个生命力，在于创作者对时代和人性的发现及其个性化展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建功的早期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痕迹，但那个时代的转折使他开始新的人生，也由此开始新的文学，倒是令他豪情满怀的事儿。

在 1980 年前后，陈建功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可谓是出手不凡。比如小说《盖棺》《辘轳把胡同 9 号》《京西有个骚达子》《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等等，都是那时写的，虽然是创作早期的作品，人物生活的背景也和今天大不相同，但其中寄托的情感取舍、人性思考、文化反思，至今读起来仍令人深思。

陈建功写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前科》，对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仍可给人一些启发。30 年前为北大 90 周年校庆写的散文《默默且当歌》，在北大成立 120 周年的纪念册里仍然被采用。这些作品有多么大的价值，值得人们评说。而且这些小说是陈建功走过人生和写作的弯路之后而发出的真诚之声。

斥“装孙子”

1984年，陈建功的中篇《找乐》在《钟山》发表。陈建功在篇末的创作谈里说到“装孙子”的事儿，那篇文章叫《小说起码》。当时，邵燕祥读过后对陈建功说，你写得对，但你这话可得罪人了。不过那话确实是陈建功学习写作十年后的由衷之言。

之前的陈建功，被时代所挤压，却拿起笔，歌颂那个挤压的时代。对当时的一些存在充满了怀疑，却不断地寻找着理论，论证那存在的合理。被生活的浪潮击打得晕头转向，迫不急待地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这就是陈建功所讥讽的“装孙子”。历史的转折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它使陈建功认识了自己，认识了人生，也思考什么是文学。

作家能否为读者提供真实的人生图景，首先取决于他的真诚与他的为人、为文之道。一个作家，不管他生活在什么时代，没有这种真诚，没有这种勇气，就难免不粉饰生活以趋时尚，不歪曲现实以博喝彩。

陈建功所斥骂的“装孙子”，其实是出自自我的反省，是说为人为文之道的。如今回忆起来，只能用话糙理不糙来解释这种言说的粗糙吧。在自己有了切肤之痛之后，发现还有人走欺世、媚俗之路，就算人家是为了混个温饱争个奖赏谋个肥缺，他也是要激愤的。

质疑精神

入读北大给陈建功带来了什么呢？陈建功回答曰，是质疑精神。

77级、78级的本质不仅仅是一些人命运的改变，也不仅仅是人才通道的重开。改革开放时代带来的最伟大成果，是“人”的解放。其实高考恢复后，高校间关于如何培养理想、信念，还争执不休。有人还祭出老的思想武器，说必须给学生们灌输再灌输。北大的声音则认为，任何理论，就算是真理，也要通过质疑和实践，由社会实践来检验，由个体实践去感悟。

1982年陈建功毕业时，给北大党委写过一封思想汇报，登在了北大的校报上，还被《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几大报全文转载。说的就是要鼓励青年这种质疑精神，让我们从质疑中坚定真理信念，从质疑中走出自身的局限。而不得置疑的“迷信”、不容置疑的“灌输”，只能豢养家奴和“两面人”。文革时代对马克思那句“怀疑一切”的座右铭，是讳莫如深的。实际上，怀疑一切，就是说真正的信仰需要在实践中建树，在质疑中坚定。

编排话剧

陈建功自认为是一个生性内向的人，甚至不喜欢什么风云人物。但生在一个活跃的时代，只能说被风云所裹挟。比如介入了文革结束后第一本大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的创办。其实那是武汉大学77级、78级同学之首倡，他们遭遇了更大的误解和打击。而到了北大，通过与党委的沟通和理解，并没有成为问题。

同时进行的话剧排演也一样，但那“演职员”阵容是值得自豪的。陈建功是编剧，王

小平、黄蓓佳在剧中扮演姐妹，她们后来成为了优秀的编剧和作家。当时出演父亲的刘志达，退休前是《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比他饰演的角色更赢得喝彩的一个角色是，1981年那次中国男排战胜韩国男排而引发的北大学生大游行，第一个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就是此公。话剧里的“男一号”李彤，当时饰演一个上访老人，毕业后成为了《人民日报》记者，他1988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红高粱西行》以及此后一系列关于中国电影的长篇通讯，至今还被电影界津津乐道。

《良心》是陈建功写的唯一的独幕剧，还是挺有激情的。戏剧性较强，几位演员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陈建功在北京人艺跟着刘厚明、蓝荫海学过写剧本，排演这戏时，还把当过演员的剧作家蓝荫海请去给导演了一下。上演时，北大礼堂座无虚席，看完后观众还热情叫好。这部剧后来还在大学生汇演中得了奖。

“兼容并包”理念

独立思考、质疑精神，大胆的艺术实践，这都是艺术个性形成的前提，但人们常说的，自蔡元培时代就倡导的“兼容并包”精神和这些是怎样的关系呢？

对此，陈建功胸有成竹，他说，有了“兼容并包”，才有了对个性的容忍、欣赏和倡导，纷纭的思想其实是一个时代健康的前提，也是使我们更接近真理的前提。

陈建功后来到中国作协参与一些领导工作，秉持的也是这个理念。任何文场，作家们的思想歧见、个性差异、情感特质、艺术主张，林林总总，乃至朋友的圈子，岂不都如杂花生树，草长莺飞？不管自己秉持什么样的社会观、文艺观，和谁亲，和谁近，都不应以“运动”的方式解决。作家间存在不同的文学观点是必然的，执着于个人的思考也是难得的。所谓“兼容并包”，至少应该容许别人讲话，倾听别人讲话，使自己在倾听中有所丰富和纠正，这才是文学界应该倡导的风气。

喜爱平民文化

陈建功很早就对民俗学，特别是北京的平民文化有探究和积累，从平民文化中汲取了营养。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陈建功受到了平民文化的启发。那种启发，除了来自寻根文学，还来自台湾文化界的一些思考和实践。比如那本《汉声》杂志，把我们的民间遗产如剪纸、皮影、秧歌再现出来，魅力四射。

陈建功的兴趣，是从阅读顾颉刚等人撰写的《妙峰山调查》开始的。当时参与妙峰山调查的五位学者中，陈建功曾到干面胡同求教过容肇祖先生。随后渐次读了张次溪、李家瑞等关于旧京民俗的专著，也关注每年民俗学年会的研究成果。陈建功说，过去对北京民俗文化事象虽有所关注，稍稍读几本研究著作，就有茅塞顿开之感。

其实对大众民俗文化的态度，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前不久，陈建功和几个同学还讨论

起郭德纲、岳云鹏。大众俗文化在文化市场活跃的今天，当然有复杂的情况，但一概斥以“三俗”，陈建功以为是过于简单粗暴了。郭德纲、岳云鹏的相声里，有鲜活的平民思想，传递了都市蚁族的自嘲，其实反倒是呈现了“卑贱者”的精神优势。当然陈建功没法儿展开较全面的评论，但这使我们这个时代感染了一层人的快乐，难道不值得作家们去学习吗？

分管文学评奖

陈建功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时，分管了好几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评价活动，让人印象颇深。

从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和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开始，书记处方面分管两个奖项评奖的人都是陈建功。也就是说，在陈建功任职的14年间（1995年-2009年），这两个奖项的每届评奖，从《条例》的修订到评奖的全过程，包括新闻发布、颁奖大会，都是由陈建功牵头的。

陈建功的出发点是，评奖的目的不是招得作家们追名逐利，而是通过某种鼓励，总结文学成果，提升文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情感世界和文学水平。

陈建功接手评奖的组织工作时，张光年、冯牧等老领导都说过，评奖的目的是“讲评”，评出奖了，是好是坏要到社会上评一评，要美誉，也要说不足。陈建功认为，这是从文学全局乃至文化建设的大局出发的精辟之论。如果不吸取这些经验，一味只是追求评奖结果，甚至把评奖结果和地方政绩挂了钩，或者把评奖做成了“发奖”，某些所谓文学奖给钱就发奖，它的公信力就堪忧了。

评奖《白鹿原》

陈建功说过，评奖其实也是一个使他本人受教育的过程。

比如对《白鹿原》的评奖，当时社会上有人持不同意见的。第一次评委会举行时，陈建功很担心这个。因为评委会的构成，包括了各类持不同文艺观点的评论家，按照陈建功的经验，评委会上可能会因此吵起来。天翻地覆怎么收场？

让陈建功意外的是，最担心对这部作品发难的老评论家陈涌第一个发言，他坦言自己未读之前受过一些同志的影响，认为这或许就是一部历史观有问题的作品，为对评奖负责，认真读过几遍之后，认为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可以说得上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力作”。陈涌发言后，会场短暂地寂静。

陈建功估计，在场无论是推崇此书还是否定此书的评委，都大感意外。后来，陈建功也陷入反思：为什么会陷入这种简单的推断呢？把人划进这个圈子那个圈子，以圈子臆测，简直是低估了一位老评论家的良知和水平。

在中国作协的十四年

陈建功到中国作协，是受了韩少功的影响。韩少功去海南时曾经给陈建功来信，说是

在湖南待腻了，去海南增加点阅历，也好到老年时给自己增加一点回忆。陈建功在1995年上任之时，写过一篇文章登在《作家通讯》上，说之所以到中国作协来，无非就是学韩少功，增加点阅历。

当然，陈建功的创作是受到了影响的。但陈建功也给自己打过问号，若不来，就能像韩少功那样写得那么好，那么多吗？人生就是这样，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陈建功在作家里面知己甚多，有些事打个电话去就解决了，再解决不了的，飞过去喝顿酒也解决了。

在中国作协十四年，陈建功曾写过两句打油诗：历尽劫波尚有泪，写完简报已无诗。在主席台上递给了时任党组书记的翟泰丰，翟泰丰撇嘴退回给陈建功，说：“不好！太消极了！”又侧身递给王蒙，王蒙用铅笔改了几个字，批示说：“这么改，才合平仄”。

散会后，陈建功对二位说，泰丰啊，您一以贯之，就担心我的导向！王蒙啊，您也一以贯之，耳提面命！王蒙说，你听我面命吗？你是能面命的人吗？

后来，陈建功知道自己马上将接到退休通知，又随意涂抹两句：弹冠解甲何足庆，率性蓬蒿任尔风。改天看望泰丰同志时，还得呈上问问导向，王蒙那儿呢，不知他还改不改平仄？——特有趣的人。

组织“换笔大会”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陈建功对电脑还是一无所知。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是位美国作家，曾召集当时活跃的中国作家们开了一次派对。谈起写作，包柏漪建议大家到她书房看看，说她用上了“新玩意儿”，展示她的电脑，当时也就相当于286吧。

90年代初，又传来马识途和徐迟使用电脑的消息。大概因为少年时玩过晶体管，陈建功自嘲曰，性喜“奇技淫巧”。听说中国实验话剧院刘树纲（《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的编剧）买了电脑，陈建功连夜赶到他家，在他书房里摆弄了一宿。

陈建功玩286时，中国还在推行中华学习机。后来接触了一家很热心推广电脑写作的公司，就策划了一次作家换笔大会。那次开幕会上发言的有赵大年，刚刚学会电脑打字，有点已然先锋、睥睨众生的自负。谦和的老大姐杨沫，其实并不是真的要换笔，不过是给年轻的同行们打气来了。

换笔大会的社会影响不小，由此登门求陈建功代为购买电脑的朋友不少，时不时会有人半夜打来电话，问陈建功关机热启动按哪三个键之类的问题。

对“奇技淫巧”的热爱

陈建功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不单正经的学问好，对支付宝、微信、淘宝、共享单车之类的，其学无所不窥。有时候出门办事不好停车，扫个码骑个共享单车，很方便，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陈建功觉得，就这么紧追新潮还追不上呢。王蒙比陈建功大，都八十多岁了，还天天

给陈建功发来腕表计步，每天大约一万步，闹得陈建功臊眉耷眼，时不时得出去走一圈凑步数，可不能栽了这个面儿。

至于微信，陈建功也用，但不沉迷。陈建功说，他看过一则消息，说西方学界开始对大数据时代的隐私保护等问题有所警惕了，由此又说到恐怖犯罪的新花样等等，因此，陈建功对微信并不沉迷。